

浙江对辛亥革命的前期影响

张杰¹, 姜华帅²

(浙江海洋学院 水产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浙江与辛亥革命有着紧密的历史关系: 浙江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壮大和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对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 浙江; 光复会; 民资族本主义; 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1) 04-0004-03

1911年, 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爆发, 结束了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 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浙江在这一革命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浙江革命团体为临时政府雄踞东南开辟了政治条件

100年前的江浙地区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最频繁的地区。1904年11月, 同盟会的主要创建团体之一光复会在上海成立, 以“排满反清”为政治口号, 主张通过文字宣传、暗杀和暴动等手段来达到革命目的, 力图夺浙皖, 据南京, 然后北伐覆清。光复会虽然成立于上海, 但其创始者和主要会员大都出身于浙江, 以会稽、余姚、嘉兴、金华、绍兴、嵊县等地为多, 其重要成员中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张恭、秋瑾、龚味生等均为浙江人士。

为了尽早实现革命目的, 光复会大力发展革命同盟力量, “陶成章等为了联络闽浙会党, 日行百里, 昼行夜宿, 跋山涉水……跑遍浙江全省”^{[1]72}; 秋瑾在驻杭新军中发展光复会员, 奔走筹款, 联络浙江秘密会党, 作组织起义准备。^[2]当时各地会党的重要成员纷纷加盟入会, 影响比较大的有“龙华会首领沈荣卿、周华昌, 双龙会首领王金宝, 龙华会处州首领吕逢樵, 平阳党首领竺绍康”^[3]等。在光复会的积极联络下, 这些地方会党逐渐统一革命行动, 革命范围由分散连成一片, 为日后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同盟基础。

1907年, 光复会策划发动安庆起义失败, 徐锡麟、秋瑾等人遇害牺牲, 革命遭受了暂时的挫折, 但是徐锡麟、秋瑾等人的牺牲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轰动, “浙西一带之梟党……大举暴动, 连蹂躏浙西江南之诸府”^[4], “内而朝臣莫不骇然以惊, 外而督抚莫不悚然而恐”。^[5]这次失败之后, 光复会认识到单靠地方会党的力量不足以撼动清政府统治, 并对革命发展战略方针做出了相应调整, 把革命的工作重心从会党转向新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当时新军的一部分军队逐渐演变成为革命党的后备部队, 他们后来成为光复浙江的重要力量。

武昌起义后, 光复会在上海响应鄂省独立, 江苏亦宣告脱离清政府, 随后光复会在杭州发动起义光复浙江。江、浙、沪的纷纷

收稿日期: 2011-06-05

作者简介: 张杰(1990—), 男, 河南项城人,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姜华帅(1982—), 男, 山东莱阳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独立,巩固了上游湖北的独立,对推动长江沿岸省区的独立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胜利,则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础。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光复会积极响应革命需要,会同浙军、沪军、苏军,组成江浙联军,向南京清军守军发起联合进攻,“光复军悬赏官兵,组成 192 人的敢死队,肉搏拚刺,突破清军最后防线,光复南京”。^[6]而此时,长江上游地区革命形势却不容乐观,汉阳失守,鄂省形势危急,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受命为援鄂军总司令,率部前往武昌,为保卫武昌作出了卓越贡献。

光复会作为辛亥革命反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舆论宣传,覆清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孙中山评价说:“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现于天下。”^[7]光复会为国内革命力量底定东南,进而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二、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辛亥革命准备了重要物质基础

清朝末期,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各阶层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推动,使江浙地区成为全国最早出现实业救国思潮的地区。1907 年,江浙人民针对清政府变相出卖沪杭甬铁路路权的行为掀起了一场“拒洋款、集民股”的爱国保路运动。他们自发成立浙江铁路公司,通过广泛的募股集资证明江浙完全有能力自办铁路,“十个月之内,募集股金 400 万元”,^[8]并于 1909 年 8 月建成中国当时最长的商办铁路——沪杭铁路。这次爱国保路运动得到了包括立宪派在内的社会各阶级的大力支持,运动形势愈演愈烈,最终迫使清政府同意废止之前签订的铁路借款合同,这是浙江人民实业救国的一次伟大实践,江浙保路运动的胜利,揭开了全国保路运动的序幕,为其后全国范围内保路运动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总结,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从 1901 年开始,清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浙江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在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开办了一批独资或合股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影响比较大的有杭州振新肥皂厂(1901 年),宁波顺记机器厂(1901 年),杭州丰和石碱厂(1902 年),杭州官脑局(1903 年),宁波通久源面粉厂(1904 年),温州毓蒙铁工厂(1906 年),台州甬利汽船局(1906 年)等。^{[9][213]}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帝国主义对华大量的商品输入和资源输出。

民族企业数量的与日俱增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浙江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地方商会,1905-1906 年间,出现了浙江省商务总会,温州商会公所,丽水商会,杭州城北商会,嘉兴商会,宁波总商会等^{[9][215]},作为民间自发成立的民族企业服务性组织,这些地方商会在扶持民族企业,宣传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经济对华侵略势力,促进了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建设资金周转需求逐渐扩大,市场的通货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日益增长,新式银行应运而生,1907 年,浙江铁路公司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成为浙路公司周转资金及存储路款的重要金融枢纽;1908 年创设的浙江官钱局,系官办地方性金融机构,资本总额达到 100 万元;^[10]1909 年,浙江省第一家储蓄银行——大通商业储蓄银行在湖州成立。这些起初作为地方性金融组织的新式银行逐渐取代旧式钱庄银号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不仅撼动了封建金融体系的地位,也促使浙江现代金融业开始慢慢起步,这也是江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重要标志。

除工商业外,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也开始渗透到江浙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中,比较著名的有建德垦牧公司(1906 年),台州垦牧公司(1907 年),湖州务本公司(1908 年)等^[11]。这些集股商办的农牧垦殖公司,从国外引进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为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数十年间,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促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逐渐产生、壮大并最终登上历史舞台,为辛亥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阶级条件。

三、浙江文化事业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

20 世纪初,在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浙江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式学堂办学高潮,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规模上,浙江的新式教育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发展近代教育成为整个浙江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共识。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实业救国者为了发展实业,也大举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在客观上也为浙江教育的变迁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大量兴办,对于推动浙江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浙江革命党人也发动革命力量通过书刊、文艺、学校等形式宣传民主革命新思想。“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73},当时在江浙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教育组织有秋瑾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和蔡元培主持的上海爱国学社等。其中绍兴大通学堂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国第一所干部学校。1902 年,江浙教育界进步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组织。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的影响,以至于很多学校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的手中。这些学校为民主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直接冲击了中国落后的封建文明意识,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浙江是 20 世纪初向日本派遣出国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些留学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12]他们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虽然大部分是自费留学,但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在思想上完成了从维新改良思想向反清革命思想的转变,不仅没有成为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傀儡,反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先觉醒的一部分,加速了满清王朝颠覆的进程。

在民主革命的宣传过程中,浙江青年在日本创办华文报刊达数十种,使得日本成为当时进行革命宣传动员的重要阵地。创办于日本东京的《浙江潮》以“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13]为办刊宗旨,在当时影响颇大,每期能发行到 5000 余册,发表过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文章,在客观上对民众的思想觉醒起到了很大的前驱作用。鲁迅在《浙江潮》上发表文章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14]以此向中国人民发出为民主而战斗的号召;1905 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创刊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先后宣传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精神;秋瑾在东京创办的《白话报》,公开发表过《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和《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同时国内杭州、绍兴等地,《绍兴白话报》、《觉民报》、《浙江五日报》、《艺林新报》、《天目报》、《萃新报》^[15]等革命报刊也广为传播,这些刊物把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与封建专制统治,为辛亥革命在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孙中山指出革命派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16]

20 世纪初整个浙江的社会思想、观念的进步与转变,促进了江浙地区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不断地冲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在民众心中的统治地位,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开辟了思想道路。

综上所述,浙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浙江人民都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入挖掘、整理和探究浙江对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和其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胡国枢.论光复会[J].浙江学刊,1982(1):72.

[2]徐光仁.秋瑾诞生百年祭[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90.

[3]沈颀民.记光复会二三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北京:文史

资料出版社, 1981: 139— 141.

[4]章太炎. 锡麟学校赞[M] //章太炎全集(五).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3.

[5]徐和雍. 略论徐锡麟[J]. 江淮论坛, 1980 (3): 92.

[6]周雷鸣. 光复会与辛亥江苏光复——兼论光复会的消亡[J]. 南京社会科学, 2004 (12): 49-50.

[7]孙中山. 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M]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46.

[8]金普森, 陈剩勇. 浙江通史:清代卷下[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35.

[9]沈雨梧.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J]. 近代史研究, 1982 (4): 213-215 .

[10]陈真, 姚洛.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三联书店, 1957: 797.

[11]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 北京:三联书店, 1958: 694-695.

[12]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75.

[13]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浙江省图书馆.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120.

[14]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上[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228-230.

[15]沈雨梧.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报刊[J]. 历史教学, 1997(12): 52.

[16]孙中山. 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M] //中山全集:第三集. 台湾:三民图书公司, 1935: 155.